

乾嘉時期清朝與達賴喇嘛的關係： 以會見禮儀爲中心

村上信明*

摘要

乾隆帝信仰藏傳佛教，抱著守護藏傳佛教菩薩王的胸懷。十八世紀末以前，駐紮西藏的清朝官員會見達賴喇嘛時，當以藏傳佛教的傳統行叩頭禮。十八世紀末時，清廷廢止官員在西藏進行叩頭禮儀，但此事並不改變清朝與西藏之間以佛教禮儀為基礎之傳統關係本質，清朝官員不行叩頭之後也必須尊崇達賴喇嘛的宗教權威。相對而言，嘉慶帝對清朝官員輕視達賴喇嘛的態度並不關心。嘉慶帝對達賴喇嘛的敬意乃流於形式，嘉慶時期的清廷與西藏的關係雖然表面上相同於乾隆時期，但本質上已有相當的差距。

關鍵詞：乾隆帝、嘉慶帝、駐藏大臣、達賴喇嘛、福康安

* 日本創價大學文學部副教授

本文的大體內容於「2016 世界少數民族文化傳承暨教學創新國際研討會」（花蓮，慈濟科技大學，2016 年 5 月 9、10 日）的會議上作了報告，席間聽到許多寶貴意見，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再，本文係 2012～2015 年度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補助金青年研究(B)《18 世紀末～19 世紀中葉の藩部政策からみた清朝帝國支配の構造変容》（研究代表者：村上信明）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Changes in the Official Rite of Audienc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Court and the Dalai Lama in the Qianlong and Jiaqing Periods

Murakami, Nobuaki*

Abstract

Emperor Qianlong, a devout follower of Tibetan Buddhism, believed he was a Bodhisattva King who bor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ibetan Buddhism. Until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whenever the *Zhu Zang Dachen* (the high Qing imperial official to Tibet) had an audience with the Dalai Lama, he was required to perform the rite of kowtow in accordance with Tibetan Buddhist practices, but at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rite of kowtow was abolished. This did not change the *de facto*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court and Tibet, which was based on the values and traditions of Tibetan Buddhism. Even though the rite of kowtow was no longer observed, the Qing high officials to Tibet were still required to respect the religious authority of the Dalai Lama. However, Emperor Jiaqing was not particularly concerned about whether the Dalai Lama's religious authority was respected by the Qing officials. His reverence for the Dalai Lama was merely a formality. Althoug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ing court and Tibet during Jiaqing's rule seemed to be the same as it had been in Qianlong's reign, it was considerably different in nature.

Keywords: Emperor Qianlong, Emperor Jiaqing, *Zhu Zang Dachen* (the high imperial official to Tibet), the Dalai Lama, Fu Kang'an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Soka University, Japan.

壹、前言

現在關於乾嘉時期清朝與西藏達賴喇嘛政權之關係的看法主要有兩種：其一，清朝與西藏達賴喇嘛政權是「支配—被支配」的關係，清朝通過冊封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制定各種章程派遣駐藏大臣等，以此管理和統治西藏。提出這種看法的主要是中國與臺灣的學者們。¹ 其二，清朝皇帝與達賴喇嘛同是「文殊菩薩」與「觀音菩薩」的化身，²或是「大施主」與「應供僧」這種基於佛教教義上的對等關係。³ 持有這樣看法的主要是日本與美國的學者。⁴

有關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西藏政府等的關係研究，有著以上的分歧和差異。前者認為，駐藏大臣「管理西藏一切事務，舉凡吏治、宗教、軍事、邊防、財政、差徭、涉外關係、商務貿易等，均歸其主持、監督或控制」，「理論上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地位平等，實際則猶在其上」。⁵ 後者認為，駐藏大臣作為藏傳佛教大施主清朝皇帝所派的代表使節，應該向達賴喇嘛表示敬意，代辦皇帝對西藏政府的支持與保護措施。⁶

近年來，筆者專心研究乾隆朝（1736-1795）後期至嘉慶朝（1796-1820）的清朝官員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之間的會見禮儀，大致明白了具體情形。本文整

¹ 例如：中國學者曾國慶寫道：「為了使他們（清朝的駐扎大臣）更好地行使國家主權之責，強化對西藏的治理，清政府數次頒布各種章程條款，不斷地提高和完善駐藏大臣的職權」。參見曾國慶，《清代藏史研究》（拉薩、濟南：西藏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1999），頁 79。對於臺灣學者蕭金松的看法，參見下一個段落。

² 參見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歴史的研究》（東京：東方書店，2001），頁 337-341，347-350。

³ 參見鈴木中正，《チベットをめぐる中印關係史——十八世紀中頃から十九世紀中頃まで》（東京：一橋書房，1962），頁 44。

⁴ 參見 David M. Farquhar, "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8, No.1, 1978, pp. 5-34; Evelyn S. Rawski,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p. 247-263.

⁵ 蕭金松，《清代駐藏大臣》（臺北：唐山出版社，1996），頁 233。

⁶ 參見鈴木中正，《チベットをめぐる中印關係史——十八世紀中頃から十九世紀中頃まで》，頁 44。但鈴木認為，監視、統治西藏政府也是駐藏大臣的任務之一。

理筆者曾經發表過的研究成果，⁷再分析最近查到的相關史料，⁸探討乾嘉時期清朝與西藏的關係。

貳、乾隆時期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的會見禮儀

關於清朝與西藏政府關係，駐藏大臣在布達拉宮所行的「上山瞻禮」引起學者們的興趣。這句話出現在《欽定廓爾喀紀略》卷四十八：「嗣後駐藏大臣除上山瞻禮外，其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⁹對於這個問題，劉麗楣（1953-）曾論述道：

（駐藏大臣）在處理與達賴喇嘛的關係時，往往失之於過分地尊崇謙遜。在相見禮儀方面，雖然達賴喇嘛於樓門內相迎，但有不少駐藏大臣在上座前對達賴喇嘛行叩拜禮，一些敬佛大臣則顯得更爲崇敬。在相當一段時間內，正是由於禮儀方面的過分崇敬，而導致了駐藏大臣實際地位的下降。乾隆五十七年，即第二次廓爾喀戰爭結束後，乾隆皇帝弘曆在諭旨中尖銳地批評了駐藏大臣的失誤，……乾隆皇帝弘曆一改過去對達賴喇嘛「外貌不妨稍事優隆」和「稍加優禮」的態度，多次指示「欽差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係屬平等，不必瞻禮，以賓主禮相接」，並明確「不准與達賴喇嘛叩頭」。¹⁰

以此認爲，「對達賴喇嘛行叩拜禮」是「不少駐藏大臣」基於個人判斷進行的，那是「過分崇敬」的行爲，不合乾隆帝的「稍事優隆」的方針。

⁷ 本文的第貳章是整理村上信明，〈駐藏大臣の「瞻禮」問題にみる 18 世紀後半の清朝・チベット關係〉，《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 81 號（2011），頁 48-55；村上信明，〈嘉慶朝の清朝・チベット關係に関する一考察——駐藏大臣とダライラマの關係についての認識を中心に〉，《史境》，第 64 號（2012.3），頁 58-67 的內容來總結的。第肆章、第伍章所提的關於豐紳「更改舊例」問題，也在村上信明，〈嘉慶朝の清朝・チベット關係に関する一考察——駐藏大臣とダライラマの關係についての認識を中心に〉仔細地探討過。

⁸ 本文第叁、肆、伍章所論及的福康安、駐藏大臣文弼與達賴喇嘛的交涉情形，屬於新的研究成果。

⁹ （清）方略館纂，《欽定廓爾喀紀略》（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卷 48，頁 11 右、左，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條。

¹⁰ 劉麗楣，〈關於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相見禮儀問題〉，《中國藏學》，第 1 期（1997），頁 72。

相反，鈴木中正（1913-1983）則敘述：駐藏大臣因為是擁有藏傳佛教大施主身分的清朝皇帝所派的代表使節，而向達賴喇嘛表示敬意，進行瞻禮。¹¹ 鈴木對於「瞻禮」的理解，與上述劉麗楣的看法完全不一樣，他認為這不是私人的行為，而就是崇敬達賴喇嘛宗教權威之禮儀。

另外，廖祖桂（1929-）等也寫道：

新任駐藏大臣到拉薩上任後，均應到布達拉宮供奉皇帝聖容的薩松南傑殿仰聖容，之後到經堂與達賴喇嘛會晤，相互存問。這當然是禮節性拜會。這就是上山瞻禮的內容和過程。¹²

以此認為，駐藏大臣之「瞻禮」不是尊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得尼的禮儀，而是「禮節性拜會」。這個看法與劉麗楣、鈴木中正又不一樣。

那麼，「上山瞻禮」到底是什麼樣的禮儀呢？「上山」就是「前往布達拉宮」，¹³「瞻禮」就是「瞻仰禮拜」的意思。駐藏大臣的「瞻禮」是按照佛法的禮儀向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等瞻仰禮拜，表示敬意。據《欽定廓爾喀紀略》卷三十，乾隆五十七年（1792）閏四月二十四日條載：「再聞，和琳平素敬佛。此次到藏時，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自必照常瞻禮致敬。於佛法固當如此」。¹⁴ 再，嘉慶十九年（1814）閏二月，曾擔任過駐藏大臣的和寧在奏摺中寫道：「從前相沿舊習，駐藏大臣見達賴喇嘛亦以佛法瞻禮」等語。¹⁵

而「瞻禮」的具體情形如下。駐藏大臣首先「於布達拉宮恭仰聖畫（即供奉在薩松南傑殿的皇帝聖容），其後會見達賴喇嘛」，¹⁶那時「達賴喇嘛並不下座」，¹⁷駐

¹¹ 參見鈴木中正，《チベットをめぐる中印關係史》，頁44。

¹² 廖祖桂、李永昌、李鵬年，《「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版本考略》（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65。

¹³ 參見廖祖桂、李永昌、李鵬年，《「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版本考略》，頁64-65。

¹⁴ （清）方略館纂，《欽定廓爾喀紀略》，卷30，頁13右，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二十四日條。

¹⁵ 「軍機處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初六日，和寧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館藏號165-8005-2。該史料收錄於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第5冊，頁2216。

¹⁶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七日，雅滿泰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館藏號3166-003（膠卷號140-1141）。

¹⁷ 「軍機處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初六日，和寧奏摺。

藏大臣「每見達賴喇嘛必先磕頭而後坐」。¹⁸ 這裏的「磕頭」就是「叩拜」（滿語：hengkilembi）。然後，駐藏大臣獻哈達，達賴喇嘛授予福德。駐藏大臣的滿文奏摺中有具體記載。乾隆五十二年（1787）六月初七日，駐藏大臣雅滿泰奏稱：「奴才（雅滿泰）又依據會見達賴喇嘛之禮，行叩頭，獻哈達」。¹⁹ 這些決不是出自個人判斷、自行酌定的行爲，也不是「禮節性拜會」，而是駐藏大臣會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時應該做的，是根據藏傳佛教習慣而行的禮儀。

但是，第二次廓爾喀戰爭（乾隆五十六至五十七年，1791-1792）結束後，爲了明確表示駐藏大臣的地位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而高於其他呼圖克圖、噶布倫等西藏方面的高層人員，清朝改變駐藏大臣會見達賴喇嘛等的禮儀。²⁰ 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阿桂議覆（乾隆帝裁可）寫道：「應如福康安（1754-1796）等所奏，嗣後駐藏大臣上山瞻禮一節，應聽其自行酌量不必勉強外，其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²¹ 原任駐藏大臣和寧（1741-1820）在嘉慶十九年閏二月上奏的奏摺中寫道：「乾隆五十八年（1793）欽奉上諭，欽差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係屬平等，不必瞻禮，以賓主禮相接」；「大學士松筠（1754-1835）亦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冬到任，奴才等因公赴布達拉與達賴喇嘛會見時，達賴喇嘛下座迎至樓門內，彼此以哈達相授，達賴喇嘛仍上高座。至奴才等坐位，設在達賴喇嘛高座之西，俱一字平列南向，事畢，喇嘛送至樓門內」。²² 至此，關於駐藏大臣的坐席也有改變。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原任駐藏大臣松筠奏稱：「駐藏大臣原係旁坐，……向外一字平坐始自和琳」等語。²³ 奏文中的和琳（1753-1796），是乾隆帝寵臣和珅（1750-1799）之弟，自乾隆五十七年二月至五十九年七月擔任駐藏大臣。最後，乾隆五十九（1794）年八月，乾隆帝降旨：「將此寄信（駐藏大臣）松筠，令伊抵藏後，須與和琳同樣，不叩拜達賴喇嘛，與其他呼圖克圖、噶布倫等會見之禮，

¹⁸ 「軍機處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閏二月二十七日，松筠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館藏號 165-8005-5。該史料收錄於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 5 冊，頁 2219-2220。

¹⁹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初七日，雅滿泰奏摺。

²⁰ 參見村上信明，〈駐藏大臣の「瞻禮」問題にみる 18 世紀後半の清朝・チベット關係〉，頁 64-66。

²¹ 馮明珠主編，《廓爾喀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沉香亭企業社，2006），第 4 冊，頁 2090，乾隆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阿桂等議覆。

²² 「軍機處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初六日，和寧奏摺。

²³ 「軍機處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閏二月二十七日，松筠奏摺。

亦均照和琳之例辦理」。²⁴

總之，乾隆五十七至五十九年間有了如下三點變化。第一，駐藏大臣不必瞻禮，最終也禁止向達賴喇嘛叩頭。第二，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會見時，達賴喇嘛下座迎至樓門內，會見結束後，達賴喇嘛再把駐藏大臣送至樓門內。第三，會見時的駐藏大臣的坐次「原係旁坐」改為「設在達賴喇嘛高座之西」，「向外一字平坐」。

參、禮儀變化的契機：八世達賴喇嘛與福康安的邂逅

這樣變化的直接契機是八世達賴喇嘛（1738-1804）與福康安的邂逅。

眾所周知，福康安是乾隆後期的一位寵臣，也是制定西藏統治政策的關鍵人物。乾隆五十六至五十八年間，福康安為征討廓爾喀而領兵入藏，與八世達賴喇嘛會見數次，共同商議有關戰役、善後事宜等事。清朝——西藏關係史上著名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也是通過他們的商議所制定。

七世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八世達賴喇嘛傳》中，關於福康安與達賴喇嘛初次會見時的座位安排與禮儀形式也有詳細的記載。關於座位安排的記載如下：

中堂大人（福康安）抵達。……布達拉宮頂上，旗幟招展，法器鳴奏，吉祥彩幔懸掛宮頂，盛況空前。之後，按照新年儀式將措欽寧巴大殿裝飾一新。在達賴喇嘛寶座之右側設班禪大師之座位，左邊為中堂大人擺設了一個比達賴喇嘛寶座稍低一點的緞褥座位。這三個座位都坐北朝南。²⁵

關於此事，福康安的奏摺中也有同樣的記載。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的奏摺中寫道：「並經達賴喇嘛領於座旁另設一座，令臣並坐」。²⁶ 這樣的安排頗似於乾隆帝

²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岳麓書社，2011），第24冊，原文頁147，譯文頁434，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十一日，寄信松筠。

²⁵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183（未閱藏文原件）。

²⁶ 張羽新、張雙志主編，《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彙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第25冊，頁486。

在熱河須彌福壽廟與六世班禪額爾德尼（1738-1780）進行神秘儀式時的座位配置。根據曾經參加六世班禪額爾德尼訪問乾隆帝之旅的印度瑜珈師普南吉爾的口述報告記載：「那裏早已準備好了三個座位，中間的座位比兩邊的座位都厚，高高升起，喇嘛（六世班禪額爾德尼）就坐在上面。然後，他請（乾隆）皇帝坐在右邊比較低的座位上，章嘉古如（1717-1786）坐在他左邊的座位上面」。²⁷ 這就說明，西藏方面基本上按照接待乾隆帝時的方式來準備福康安的座位。在《八世達賴喇嘛傳》中，達賴喇嘛也說道：「派來如第二皇帝一樣的大臣你（福康安），我心中真是感戴恩德，故特為大皇帝之大臣你設此寶座」。²⁸ 《八世達賴喇嘛傳》中又寫道：「按常規為大臣等其他眾官員也準備了座位」。²⁹ 此中的「大臣」就是駐藏大臣，「常規」指的是如上所述的駐藏大臣會見達賴喇嘛時要「旁坐」的例規。從此可知，福康安來到西藏以前，在布達拉宮裏的駐藏大臣的坐次與「其他眾官員」一樣，就是「旁坐」，其地位明顯低於達賴喇嘛。但他在西藏時，清朝為了提高駐藏大臣的地位與權力，規定駐藏大臣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³⁰ 此后，和琳等駐藏大臣的坐次改為平坐。

另外，根據《八世達賴喇嘛傳》的記載，福康安會見八世達賴喇嘛時說道：（a）「現在見到真佛，請准許我叩拜」。³¹ 達賴喇嘛對他懇切地說：（b）「大皇帝乃諸佛之父尊，實為文殊菩薩，為我西方聖教與眾生。你如大皇帝之眼珠。此來西藏，像你這樣的大人沒有向喇嘛我跪拜的例規。請不要這樣做」。³² 福康安又說：（c）「達賴喇嘛敬重大皇帝的龍體，不接受我的跪拜，這說明（喇嘛）深知朝廷禮儀。故今日可以暫時不拜，請准許今後叩拜。……後在單獨會見時，達賴喇嘛領受了中堂大人的叩首施禮，由此更知中堂大人的人格」。³³ 這裡的「叩拜」指的就是如上所述的按照佛法禮儀所行的「瞻禮」。當時達賴喇嘛不讓福康安叩拜的情形，從福康安的奏摺中也可以看出。乾隆五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的奏摺中寫道：

²⁷ 塞繆爾·特納著，蘇發祥、陳沈萍譯，《西藏札什倫布寺訪問記》（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頁328-329。關於那時乾隆帝與六世班禪額爾德尼的宗教性交流之詳情，參見王曉晶，《六世班禪進京史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²⁸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4。

²⁹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3。

³⁰ 參見廖祖桂、李永昌、李鵬年，《「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版本考略》，頁64-67。

³¹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3。

³²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4。

³³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4。

至臣接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儀注，前奉諭旨：以臣身為將軍，且為安輯衛藏前往，初次見面傳旨，自應毋庸向其行禮，但藏內番眾素所敬重，亦未便不稍為加禮，令臣斟酌情形，以飾觀瞻而存體制。臣於傳宣諭旨畢後，即 (A) 請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上座，欲以佛法相見。(B) 當經達賴喇嘛固辭，並稱，向來大人們到藏，仰大皇帝崇重黃教之意，相見行禮，已不敢當，今特遣大將軍帶兵遠來，永衛佛法，僧眾皆慶敬禮，實非尋常大臣官員可比，我等出家人斷不敢坐受拜見。隨即執手讓坐，謙遜再三，固辭不允。(C) 臣見其言辭諄切，實因感荷聖恩，待臣特為加禮。〈朱批：是〉臣是以曲從其意，當只彼此問訊，合掌致敬。³⁴

此文 (A) 的「欲以佛法相見」就是上述《八世達賴喇嘛傳》(a) 的「請准許我叩拜」，(B) 和 (b) 的內容也大體一致。(C) 的「臣是以曲從其意，當只彼此問訊，合掌致敬」這段文字的意思相等於 (c) 的「故今日可以暫時不拜」。原來，乾隆帝也覺得以福康安「身為將軍」，「初次見面傳旨，自應毋庸向其行禮」，可是他同時說「亦未便不稍為加禮」，令福康安「斟酌情形」。這就說明，福康安按照達賴喇嘛的反應才能決定行不行叩拜，假如達賴喇嘛沒理解乾隆帝的心願與「朝廷禮儀」，不固辭他的叩拜的話，福康安就會不得不行叩拜了。

從上面所舉的史料可知，當時八世達賴喇嘛格外地優待「如大皇帝之眼珠」的福康安，讓他免除叩拜之禮。而且，這時的禮儀形式，如同上述的座位安排，成為日後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的相見禮儀。

肆、嘉慶時期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會見禮儀的變化

關於乾隆五十九年以後會見禮儀的變遷，在此通過嘉慶十九年發生的駐藏大臣座次問題進行考察。

據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的諭旨記載，達賴喇嘛派堪布等帶書信二封，一封

³⁴ 張羽新、張雙志主編，《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彙編》，第 25 冊，頁 485-486。

給拉旺多爾濟及蒙古衆王公，一封給噶勒丹錫呼圖呼圖克圖等駐京的高層喇嘛。隨之，拉旺多爾濟將此事轉告理藩院尚書和世泰，然後和世泰又將此話轉奏嘉慶帝。據和世泰的奏摺，其信中寫道：

從前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相見儀注，達賴喇嘛係正坐，駐藏大臣係旁坐，達賴喇嘛坐褥層數較多，駐藏大臣坐褥層較少。近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並坐，且所鋪坐褥相等，不分高下，係自豐紳駐藏之時更改舊例，後任至今相沿……。

35

此史料中提及的豐紳是佟佳氏，鑲黃旗滿洲旗人，嘉慶十七年（1812）三月被任命爲駐藏幫辦大臣，不久即回任成都將軍（駐留拉薩僅四十天），嘉慶十八年（1813）三月去世。³⁶ 嘉慶帝聽到此奏後，命駐藏大臣及四川總督等調查。當時，豐紳（?-1813）已經去世，但是豐紳在拉薩時的管家俞文鳳還健在。俞文鳳供述豐紳會見達賴喇嘛時的情形：

我於十七年隨侍家主豐將軍於五月內抵藏，家主即日赴布達拉，在純皇帝聖容上磕頭，並往見達賴喇嘛，彼時達賴喇嘛係屬正坐，家主旁坐。家主回署後，查知從前松中堂、和大人、英大人、策大人、成大人與達賴喇嘛相見儀注，都係達賴喇嘛居中正坐，欽差大人在達賴喇嘛西首一字向外平坐，惟達賴喇嘛係屬高坐，欽差坐褥較達賴喇嘛矮些。後來不知何時山上將欽差坐次改爲旁坐。家主查知後，責備山上管事大喇嘛妄將坐次改了。又傳到總堪布及四家噶布倫，狠狠的訓飭了他們一頓，並當面向第穆呼圖克圖辯論。該堪布等俱自認錯誤，嗣後仍將坐次照依前輩達賴喇嘛見欽差大人儀注，於西首向外一字平坐是實。³⁷

據俞文鳳的供詞，豐紳第一次會見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正坐，豐紳旁坐。這就與乾隆五十七至五十九年間確立的會見新式禮儀不同，大概與舊式禮儀是一樣的。

³⁵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第19冊，頁21-22，嘉慶十九年正月二十六日，寄信瑚圖禮等。

³⁶ 參見（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揚州：廣陵書社，2007），第14冊，卷306，頁9245下-9248上，豐紳列傳。

³⁷ 「軍機處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四川總督常明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館藏號165-8005-1。其中有俞文鳳供詞。該史料收錄於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5冊，頁2213-2215。

禮儀是何時開始改變的呢？據俞文鳳供詞，「松中堂、和大人、英大人、策大人、成大人」即松筠、和寧、英善（?-1809）、策巴克（?-1812）、成林（?-1817）擔任駐藏大臣時，「在達賴喇嘛西首一字向外平坐」。策巴克、成林擔任駐藏大臣時的嘉慶九年十月，八世達賴喇嘛圓寂，想必會見禮儀的改變應該與八世達賴喇嘛的圓寂有關。嘉慶十三年（1808）九月，為參加九世達賴喇嘛（1805-1815）坐床儀式所派的喀喇沁王公滿珠巴扎爾（?-1828）等奏言：「奴才滿珠巴扎爾、奴才慶惠、奴才隆福（?-1810）、奴才噶勒丹錫勒圖呼圖克圖俱行叩拜，並照賀禮獻哈達、禮品時，呼畢勒罕甚是高興接受，並授與福德」。³⁸ 據此記載，滿珠巴扎爾等會見新坐床的九世達賴喇嘛時進行「叩拜」，這就是乾隆五十八年以前的舊式禮儀。從此可以推測，西藏政府方面大概是以嘉慶十三年九月九世達賴喇嘛坐床為契機，將會見禮儀改回原來形式。

筆者估計，至嘉慶十七年為止豐紳前往布達拉宮的時間內，駐藏大臣按照舊式禮儀會見達賴喇嘛。雖然沒有具體記載的史料，但可以從七世第穆呼圖克圖對駐藏大臣的看法推測得到。七世第穆呼圖克圖（1778-1819）與駐藏大臣文弼比較親近。《九世達賴喇嘛傳》中寫道：「駐藏文（弼）大臣在駐藏期間，遵照皇帝諭旨妥善辦理了漢藏一切事宜」；³⁹ 「文（弼）大臣長期在藏辦事，穩重、踏實，不擾害、欺壓噶廈各機關辦事人員及下屬百姓，在達賴喇嘛轉世靈童認定等方面誠摯發心，從雪域佛田聖主和佛陀教法著想，奏請皇帝按照當地所有僧俗衆人意願，恩准轉世靈童立即坐床，等等。故而這位大臣是有恩之人」。⁴⁰ 文弼自嘉慶十年九月起至十三年十月擔任駐藏幫辦大臣，自嘉慶十三年十月起至十五年十月擔任駐藏辦事大臣，⁴¹駐藏時間前後共達五年。如果他沒有仿照舊式禮儀會見達賴喇嘛，而是像豐紳那樣，如此大概就會與西藏政府發生矛盾，七世第穆呼圖克圖也應該不會贊揚他。

但自嘉慶十七年，豐紳重新「更改舊例」之後，到嘉慶十九年正月「後任至今

³⁸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嘉慶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滿珠巴扎爾等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館藏號 3749-039（膠卷號 178-1446）。

原文：aha manjubadar. aha kinghui. aha lungfu. aha galdan siretu kütuktu gemu hengkilefi urgun i doroi šufa belek alibure de hūbilgan umesi urgunjeme alime gaifi adistit bahabuha.

³⁹ 第穆·圖丹晉美嘉措著，王維強譯《九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頁 62。

⁴⁰ 第穆·圖丹晉美嘉措著，王維強譯《九世達賴喇嘛傳》，頁 84。

⁴¹ 參見蕭金松，《清代駐藏大臣》，頁 267、280。

相沿」，繼續按照新式禮儀進行，此事引起西藏方面的抵抗。於此事件的調查中，清朝方面查到了七世第穆呼圖克圖派堪布等給章嘉呼圖克圖等在京喇嘛及蒙古王公傳達的一段口信與短文書信。當時，章嘉呼圖克圖要求堪布等將其口信內容寫成書信，後清朝將此書信（藏文）翻譯成了滿文⁴²（藏文原文未發現）。其滿文譯文如下：

聖文殊師利主仁慈教法衆生，又施與無極隆恩於歷代達賴喇嘛。倚仗諭旨所轉派之大小官員，俱甚是尊崇達賴喇嘛之事，至今亦談不完。現為報已出一二惡習事。嘉慶十七年特旨派來之豐將軍抵藏即交代：「欲照達賴坐位一樣坐，再使達賴喇嘛將我迎接、送別」等語。又言：「爾等唐古特人俱狡猾愚昧，是故今後照我之教導行事」等語。定下如此前所未有之新規定（禮儀），對此我處出具：預備辦理中堂及大臣等傳驛來藏禮，適才為達賴呼畢勒罕坐床而欽差喀喇沁王及大臣等所來事預備坐墊，及伊等之座次等，將一切傳統禮儀俱告之。時將軍不僅全然不聽，反而怪罪我等，怒言要將我等免職。還斥責地說：「駐藏兩大臣亦照此遵行」等語。⁴³

這段史料與前引達賴喇嘛派堪布等帶書信的內容很相似。當時九世達賴喇嘛才九歲，因此我們可以明白申訴座次問題的主體應該是攝政七世第穆呼圖克圖。這段史料可能是因為翻譯人員的能力不足，文意不太通順，可是從劃線部分可以推測，七世第穆呼圖克圖大概向豐紳說明：你要求的是為了厚待中堂（福康安）特意預備的座位與禮儀，當時駐藏大臣的座次還是旁坐，我們為你預備的是與喀喇沁王公滿珠巴扎爾參加九世達賴喇嘛坐床儀式時的座位一樣的。

⁴² 參見「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三月，呈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館藏號 3844-030（膠卷號 184-2114）。

⁴³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三月，呈文，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館藏號 3844-039（膠卷號 184-2142）。

原文：endurinnge manjusiri ejen geren šajin ergengge be gosime. geli dalai lamaï jalan jalan de moho akū ujen kesi isibuha de ertufi hesei takūrame ulame jihe amba ajige hafasa gemu dalai lama be umesi kundulehe babe gisureme wajirakū. te emu juwe ehe doro tucihe turgun be boolara jalin. saicunga fengšen i juwan nadaci aniya de cohome hesei takūrame jihe feng giyanggiyūn dzang de isinjifi dalai besergen i emu adali teki. geli dalai lama mimbe okdome fudebuki seme afabufi. kemuni alarangge. suweni tanggūt niyalma gemu hūlhi mentuhun ofi. ereci julesi mini tacime afabuha songkoi yabuki seme ongolo akū ice doro toktobuha de musei baci jung tang ambasa ulan ulan i dzang de jihe de icihiyame belhehe doro. jakan dalai hūbilgan besergen de tebure jalin hesei takūraha karacin wang. ambasa jihe ucuri de sektefun belhehe. ceni tehe eiten fe doro turgun gemu tucibume alaha de giyanggiyūn fuhali donjirakū sere anggala. elemangga muse be wakalame tušan ci nakabumbi seme ushandume. geli dzang de tehe juwe amban be inu ere songkoi kunduleme yabuki seme jorime afabuha.

對於這個問題，嘉慶帝在當年三月下了結論，諭曰：

據章嘉呼圖克圖交出西番字原劄，經理藩院譯出呈覽。其劄內並無爭論坐次及方針受饋之語。看來此事竟係無知小喇嘛等妄行傳說，不值深究。該處一切規條，惟當循照舊章妥協辦理，該呼圖克圖等自不敢妄生他議。如有不遵定制，妄生枝節等情，再行奏明請旨核辦，總以鎮靜為要。⁴⁴

如此，嘉慶帝完全無視前引七世第穆呼圖克圖口信的存在，實際上拒絕西藏政府的請求。所遵照的「舊章」、「定制」等，這些詞語指的是在乾隆末期制定的《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中的「（駐藏大臣）其督辦藏內事務，應與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平等」的規則，以及那時確立的新式會見禮儀。

伍、清朝官員對達賴喇嘛態度的轉變

上揭史料中，值得注意的是對過去清朝官員與豐紳為人的對比。七世第穆呼圖克圖訴說：過去的清朝大小官員「俱甚是尊崇達賴喇嘛」，可是豐紳沒有尊崇佛教的心理，把西藏人看作「俱狡猾愚昧」，告訴他有關禮儀的事，「不僅全然不聽，反而怪罪我等，怒言要將我等免職」。

對七世第穆呼圖克圖來說，「甚是尊崇達賴喇嘛」的代表性官員是福康安。他的著作《八世達賴喇嘛傳》中所描述的「中堂大人」（福康安）是個非常崇拜達賴喇嘛、藏傳佛教的人物。例如：「中堂大人答道：『達賴喇嘛你是真佛，依止慈悲』」；⁴⁵「中堂大人心裏特別景仰達賴喇嘛」；⁴⁶「中堂大人說：『我此次來到達賴喇嘛尊前以後，就再也不想離開了。你是真佛，怎麼做都是在做衆生之事。我也必須是前世注定能夠坐在你的跟前，修持三門之歡喜，因此希望世代仍然緊跟著你』。說著，從他身上取下鑲飾有豐富寶石的裝滿香粉的荷包獻給達賴喇嘛」。⁴⁷再，《八世達賴

⁴⁴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朝上諭檔》，第19冊，頁197-198，嘉慶十九年三月初七日，寄信瑚圖禮等。

⁴⁵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3。

⁴⁶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4。

⁴⁷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7。

喇嘛傳》中，有關福康安進行宗教活動的記載也很豐富。到達拉薩的那一天，福康安提請達賴喇嘛光臨為祈祝乾隆帝萬壽無疆所開的法會。《八世達賴喇嘛傳》中寫道：

此後（二十五日）一連三日，中堂大人做施主，在大昭寺圍廊向以哲蚌寺的喇嘛、大小活佛為代表的三千僧侶發放布施，然後又在布達拉宮措欽薩巴大殿為色拉寺的喇嘛、活佛、僧人及五百比丘僧進行布施供養，同時在此三日內為大皇帝祝壽……中堂大人親自以正確的施主福田地位，對他們景仰無限……。⁴⁸

根據這個記載，福康安作為佛教上的「施主」向眾多僧侶們行布施供養。《八世達賴喇嘛傳》中又寫道：

（水牛年（1793）正月）二十六日，中堂大人為祝達賴喇嘛長壽，請求舉行為期七天的白度母長壽儀軌，於是儀軌僧人們如往昔一樣做了法事。法事結束的當天，中堂大人親臨法會，請達賴喇嘛登上法會座首，獻上內庫哈達、漢銀一千兩，向每位儀軌比丘僧人布施銀二兩。⁴⁹

如此，七世第穆呼圖克圖把福康安看做是「如第二皇帝一樣的」特殊地位的清朝官員，也看做是特別崇拜達賴喇嘛而多次進行布施的「施主」。這些應該對於當時在西藏進行的各種改革起到積極作用。當時西藏遭受戰禍、面臨政治與經濟的危機，不能不接受清朝的幫助與改革要求。所以，作為皇帝特派大臣的福康安對達賴喇嘛、藏傳佛教的虔敬態度，起了消除西藏方面的動搖、懷疑等不安心情而順利地接受改革的作用。

對照福康安的言行實與豐紳對達賴喇嘛、西藏佛教的態度迥異。豐紳在拉薩的管家俞文鳳供述了豐紳在西藏的態度：

達賴喇嘛致送氍毹、藏香等件，是家主（豐紳）起身時送來的。家主見了禮物，當即卻退。又恐達賴喇嘛年輕，被旁人欺瞞，即傳到山上大喇嘛，當面吩咐說：「在達賴喇嘛上道謝。我向來從未受過地方禮物，雖然達賴喇嘛的禮物非他人

⁴⁸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5。

⁴⁹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麥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頁188。

可比，但我自成都來藏，並無絲毫物件布施在大昭上，所以也不敢收達賴喇嘛的禮物，你們山上送來的禮物，我已退回去了，達賴喇嘛恐不知道我不收的緣故，你回去稟知達賴喇嘛罷」。山上大喇嘛就回山上去了。家主初見達賴喇嘛時，達賴喇嘛當面給了家主兩尊藏佛，家主起身並且送還了，這是問得出來的事。⁵⁰

由此可知，豐紳不接受達賴喇嘛贈送給他的禮物，也不做布施，也退還達賴喇嘛當面給他的兩尊藏佛。他幾乎不顧及藏傳佛教的習慣，也不表示虔敬的態度，按照自己的習慣來應對達賴喇嘛。而且，他斥責總堪布及四家噶布倫時也「狠狠的訓飭了他們一頓」，⁵¹這樣態度會引起西藏方面的強烈反感。

筆者認為，這種變化的原因在於乾隆帝與嘉慶帝對藏傳佛教的態度有差異。乾隆帝對藏傳佛教的信仰很深，非常熱心地保護藏傳佛教及其僧侶。他自己懷有作為藏傳佛教世界上的「菩薩王」的明確意識，⁵²不允許官僚們表現出輕視藏傳佛教的態度。⁵³而嘉慶帝對藏傳佛教的態度卻不熱心。雖然表面上繼續優待藏傳佛教，但實際上並不尊崇佛教，⁵⁴對清朝官員輕視達賴喇嘛的態度也不太關心。筆者推測，假如乾隆帝還在世，就不會允許豐紳上述的那種舉動。

⁵⁰ 「軍機處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四川總督常明奏。其中有俞文鳳供詞。該史料收錄於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第5冊，頁2213-2215。

⁵¹ 「軍機處錄副奏摺」，嘉慶十九年二月十四日，四川總督常明奏。其中有俞文鳳供詞。

⁵² 參見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歴史的研究》，第11章；石濱裕美子，《清朝とチベット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2011。

⁵³ 乾隆五十九年（1794）八月十一日，乾隆帝降旨：「據成德來京奏稱，現和琳駐藏，諸事辦理甚妥，且見達賴喇嘛不行叩拜，達賴喇嘛惟命是聽，似甚尊重。……和琳此舉，甚為得體。大臣等若於別處如此傲慢行事，朕斷不許可」（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第24冊，原文頁147，譯文頁434，寄信松筠）。從此可以看出，乾隆帝不會允許官僚們對藏傳佛教高僧表現出傲慢自大的態度。此時決定的「不行叩拜」的例規只在前藏、後藏地區適用的。


⁵⁴ （清）曹振鏞等纂修，《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出版，1978），卷144，頁11左，嘉慶十年五月癸卯（十九日）條的諭旨中寫道：「嗣後旗民人等，務當恪守本朝清語騎射，讀聖賢書，遵守經常。釋、道二氏尚不可信，況西洋教耶」。當時的「釋」雖然一般指的是漢地佛教，但是有時也指藏傳佛教。例如：（清）慶桂等纂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出版，1978），卷1098，頁6，乾隆45年正月癸未（初四日）載：「敕諭達賴喇嘛呼畢勒罕。……爾呼畢勒罕，仰體朕意，振作釋宗，精勤經卷，意念虔誠。如前世之達賴喇嘛，闡揚釋教，……」此說明當時的「釋」指的是「佛教」（不管漢地佛教或藏傳佛教）。由此也可以看出嘉慶帝不太尊崇佛教的心理。

陸、結語

乾隆五十七年以前，駐藏大臣在布達拉宮會見達賴喇嘛時，應該以藏傳佛教的習慣行叩拜，獻哈達，這就是「上山瞻禮」。那時達賴喇嘛並不下座，朝南正坐，駐藏大臣旁坐。這樣的禮儀形式，不能以駐藏大臣個人的判斷出發而不行。他們作爲「大施主」清朝皇帝所派的代表使節，必須叩拜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表示崇拜藏傳佛教的態度。從此可以看出，當時清朝皇帝與達賴喇嘛之間明顯地存在以佛教習慣爲基礎的「大施主」與「應供僧」關係。

但是，以第二次廓爾喀戰爭爲契機，清朝在乾隆五十七至五十九年間改變了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間的會見禮儀。這個改變的源流在八世達賴喇嘛優待福康安時特意準備的禮儀方式。當時，八世達賴喇嘛特別例外地優待「如大皇帝之眼珠」的福康安，基本上按照接待乾隆帝的方式準備他的座位，也爲他免除叩拜之禮。從此以後，駐藏大臣也不必瞻禮，禁止向達賴喇嘛叩頭。再，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會見時，達賴喇嘛下座迎至樓門內，駐藏大臣在達賴喇嘛高座之西向外一字平坐，會見結束後達賴喇嘛又把駐藏大臣送到樓門內。

但是，西藏政府方面以嘉慶十三年九月九世達賴喇嘛坐床爲契機，企圖把會見禮儀改回原來的形式。當時，爲參加坐床法會所派遣的喀喇沁王滿珠巴扎爾等按照舊式的「傳統禮儀」向九世達賴喇嘛叩拜。後來，嘉慶十七年就任駐藏大臣的豐紳發現初次會見達賴喇嘛時的禮儀與八世達賴喇嘛在世時不同，就把它重新改爲乾隆五十七至五十九年間確立的新式禮儀。豐紳的強硬態度引起了七世第穆呼圖克圖等西藏政府方面的不滿。嘉慶十九年正月，他們通過留京蒙古王公、喇嘛等求助清朝朝廷。但是，嘉慶帝完全無視（間接地拒絕）他們的請求，實際上支持了豐紳的判斷。

從這個判斷可以看出，嘉慶帝對藏傳佛教的態度與乾隆帝大不一樣。乾隆帝對藏傳佛教的信仰很深，非常熱心地保護藏傳佛教，絕不允許官僚對藏傳佛教的驕傲態度。而嘉慶帝對藏傳佛教的態度卻不熱心。雖然表面上繼續優待藏傳佛教，但實際上並不尊崇佛教，對清朝官員輕視達賴喇嘛的態度也不太關心。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

「軍機處滿文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

「軍機處錄副奏摺」，北京：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

二、檔案史料彙編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彙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

馮明珠主編，《廓爾喀檔》，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沉香亭企業社，200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帝起居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嘉慶朝上諭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張羽新、張雙志主編，《唐宋元明清藏事史料彙編》，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朝滿文寄信檔譯編》，長沙：岳麓書社，2011。

三、官書典籍

（清）方略館纂，《欽定廓爾喀紀略》，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1。

（清）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揚州：廣陵書社，2007。

（清）慶桂等纂修，《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出版，1978。

（清）曹振鏞等纂修，《大清仁宗睿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出版，1978。

四、翻譯史料

第穆呼圖克圖洛桑圖丹晉美嘉措著，馮智譯，《八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第穆·圖丹晉美嘉措著，王維強譯，《九世達賴喇嘛傳》，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塞繆爾·特納著，蘇發祥、陳沈萍譯，《西藏札什倫布寺訪問記》，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2004。

五、專書著作

王曉晶，《六世班禪進京史實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3。

曾國慶，《清代藏史研究》，拉薩、濟南：西藏人民出版社、齊魯書社，1999。

廖祖桂、李永昌、李鵬年，《「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版本考略》，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

蕭金松，《清代駐藏大臣》，臺北：唐山出版社，1996。

- 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歴史的研究》，東京：東方書店，2001。
- 石濱裕美子，《清朝とチベット仏教——菩薩王となった乾隆帝》，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11。
- 鈴木中正，《チベットをめぐる中印関係史——十八世紀中頃から十九世紀中頃まで》，東京：一橋書房，1962。
- Rawski, Evelyn S. *The Last Emperors: A Social History of Qing Imperial Institutions*.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六、期刊論文

- 劉麗楣，〈關於駐藏大臣與達賴喇嘛相見禮儀問題〉，《中國藏學》，第1期（1997），頁69-75。
- 村上信明，〈駐藏大臣の‘瞻礼’問題にみる18世紀後半の清朝・チベット関係〉，《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第81號（2011），頁45-69。
- 村上信明，〈嘉慶朝の清朝・チベット関係に関する一考察——駐藏大臣とダライラマの関係についての認識を中心に〉，《史境》，第64號（2012），頁55-77。
- Farquhar, David M. “Emperor as Bodhisattva in the Governance of the Ch’ing Empire,”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38, No.1, 1978, pp. 5-34.

（責任校對：鄒武霖、釋祖道）